

第 141 回 孙文书上李鸿章 兴中会建檀香山

话说 1886 年夏天，年方 20 岁的孙中山在香港第一所公立中学中央书院（后更名为“皇仁书院”）毕业了。

孙中山，清朝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（1866 年 11 月 12 日），诞生在广东省香山县黎头山下的翠亨村。谱名德明。孙母因崇奉关帝像，生平信佛，故给幼儿取名帝象，希望将来能像关帝，稍长改名文。父亲孙达成（1813 年～1888 年）早年家道中落，家传田地多已变卖，成年后曾到澳门当过鞋匠，后还乡务农，1846 年与隔田村杨氏（1828 年～1910 年）结婚。孙文诞生时，家中除父母外，尚有祖母黄氏（1792 年～1869 年）、兄眉 1854 年～1915 年）、姐妙茜（1863 年～1955 年），共 6 口人。

孙达成为生活所需，租田 6 亩、并兼作更夫，杨氏主持家务并在农忙时帮助干活。全家所居仅村边一间干打垒的泥砖屋，长约 9 米、宽约 4 米，终年以番薯为主食，境况颇为艰辛。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回忆说：“孙中山是从民间来的。他对我讲过许多早年的事情。他生于农民的家庭……到 15 岁才有鞋子穿。他住在多山的地区，在那里，小孩子赤足行路是件很苦的事。在他和他的兄弟（孙眉）没有成人以前，他的家住在一间茅屋里，几几乎仅仅不致挨饿。他幼年吃的是最贱的食物，他没有米饭吃，因为米太贵了。他的主要食物是白薯。”

香山县位于珠江三角洲南部，物产丰富，交通便利。翠亨村地处县境东南，距县治石岐 29 公里，离澳门 37 公里，

背山临海，土质硠劣，产量甚低，乡人多外出谋生。

孙文 3 岁时，长他 12 岁的哥哥孙眉因“读书乡塾时，性情强悍不羁”，遂被令去邻乡南萌的地主程名桂家当长工；这年秋天，祖母黄氏病逝。5 岁时，妹妹绮（1871 年 ~ 1912 年）出世。同年，母亲杨氏之弟文纳由檀岛返乡，父母便将长子孙眉托付照料，令随舅父一道跟从程名桂同去檀香山。临行前，婶母程氏将两亩薄田押出作了大侄的旅费。6 岁时，他开始随 9 岁的姐姐孙妙茜上山打柴、拾取猪草。每年还要替人牧牛几个月，以换抵牛主给自己家犁翻二亩半土地的工价。有空时，还帮家中做零活，在日常不辍的劳动中身体锻炼得很结实。日后，他回忆说：“农家子也，生于畎亩，早知稼穡之艰难。”

9 岁时，孙文入村塾读书，放学回家，必帮助农作，如打禾之类，他都擅长。同村人冯爽观是跟洪秀全打过清军的老兵，他常向孩子们讲自己随太平军战斗的故事。小孙文听后，十分敬慕地说：“洪秀全要灭了满清就好咯！”见母亲给妹妹秋绮缠足，使秋绮呻吟痛苦，他就提出了反对的意见：“妹妹太痛苦了，请不要再缠她的脚了啊！”

12 岁时，哥哥孙眉回乡与谭氏结婚。孙眉初去檀香山在一个华侨的菜园里当工人，不久转到一个夏威夷人的农牧场作长工。夏威夷位于亚洲大陆和北美大陆之间的太平洋中，由 123 个大小岛屿组成，像一串长长的珠链，铺呈在太平洋海的中心海域。马克吐温称其为：并列在海洋里的的岛屿舰队。首府檀香山（火奴鲁鲁），东距美国旧金山 3846 多公里，西距日本东京 6200 公里，是太平洋地区的运输枢纽。

当时的檀香山还是个半开垦的荒岛，人口稀少，弃地很多。当地行政机构为奖励拓荒，极为鼓励领田垦殖，在舅父杨文纳的资助下，孙眉带着几个伙计申领了些田土耕种。经

过几年的辛劳，始有些积累，便转了茂宜岛。茂宜岛是夏威夷群岛的五大岛之一，孙眉在当地申领土地开垦后，雇工拓荒种植，并租种滨海沃土，廉事畜牧、种植，遂渐致富厚。

1878年初，孙眉归乡完婚之时，他向乡人讲述了檀香山的景色及物产，并以自己致富的事实鼓励乡人前往，返檀时果然招募到了一批乡民同行。孙文恳求同往，却遭父母严拒。原因是孙文的两个叔父孙学成和孙观成也在早年出洋赴美，但结果，“一个死在上海附近的洋面上，一个死在加洲产金的地方。”

次年（1879年）6月，孙文随母杨氏由水道从翠亨村直驶澳门。孙眉的伙伴郑强夫妇已雇定了英国 2000 吨轮船“格兰诺”号，自澳门载运华工赴檀香山。于是，他和母亲随船同行。外国轮船给了少年孙文以深刻的印象，而第一次离家过海的旅程，日后他依然记忆犹新：“13岁随母往夏威夷岛，始见轮舟之奇、沧海之阔，自是有慕西学之心，穷天地之想。”但同年秋天，孙母返国，他留檀香山而进入英国基督教监理会办的意奥兰尼学校寄读。学校教师几乎全为英国人，并以英语教课。孙文经过 10 余天的体会和持续发奋，终于逐渐适应了这全新的西式教育。学校开设的算术、地理、英语等课，都使他耳目为之一新；第三学年又增开了军事体操课。同学钟工宇回忆：同班有 10 位华侨学生。该校收费较其他学校高，但孙眉爱弟心切，不吝资助，故先生始终未转校。同学唐雄追述：“孙公在檀读英文时，其中文根柢颇深，西文课余有暇，常不喜与同学游戏，自坐一隅，辄读古文，吟哦不绝，有时笔之于纸……且为人沉默寡言，不苟言笑，好读史乘，如华盛顿、林肯诸先进的革命过程，故英文进步甚速。”

其时，在檀香山受聘教授当地美国政府人员学习中文奥

语的广东顺德名流杜南，正另设夜校以教华侨子弟习读中文。孙文闻讯，亦报名参加学习，故国学基础因以长进。在学校课余之后，孙文也勤读中文图书。

如此经过 3 年学习，1882 年 7 月 27 日，意奥兰尼学校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。当时的夏威夷群岛还是一个独立的小国，土著民族是波利尼西亚人。居于京城檀香山的夏威夷国国王架刺鸠、王后奄麻、宫主利利奥架兰尼等檀岛政要，均应邀与会。英文文法科由国王亲自颁奖，孙文名列第二，荣幸地领受了国王为他颁发的一本中文图书奖品。入秋，孙文升入檀岛的最高学校——奥阿厚书院。这是美国教会所办的一所高级中学。孙文本打算在此毕业后即前往美国读大学，但仅读了一年。这是由于他除平日功课外，还诚笃地参加各种宗教的聚会和课程。由于早、晚在学校教堂的祈祷，星期日在圣安德勒教堂的礼拜，孙文都坚持参加，所以主教韦礼士及夫人，对他特别关怀。而学校的《圣经》课又是韦礼士亲自讲授的，孙文对教义的研究勤谨异常，“凡与论教理者，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”。当时，该校华人同学多已成为基督教徒，孙文便向其兄述说了“亦拟受洗入教”之想。结果，受到孙眉的“责骂备至。”但是翠亨同乡杨鲲池则劝孙眉说：“此子有大志，信教亦何害，不可过于束缚。”然而，孙眉余怒未消，仍强令孙文辍学归乡。

在檀香山的 4 年西学生涯，对孙文的影响十分深刻。他日后追忆说：“忆吾幼年，从学村塾，仅识之无。不数年得至檀香山，就傅西校，其教法之善，远胜吾乡。故每课暇，辄与同国同学诸人，相谈衷曲，而改良祖国，拯救同群之愿，于是生乎。当时所怀，一若必使我国人皆免苦难，皆享福乐而后快者。”

1883 年 7 月，17 岁的孙文从檀香山抵香港后，换乘一

中国沙船归乡。途中，清朝官吏分别以征收关税、厘金、查缉鸦片、火油为借口，先后对乘客进行了 4 次勒索。第 4 次要求孙文开箱检查火油时，孙文忍无可忍地反驳说：“你们看了我行李的数目和大小、形状，便可以知道没地方可藏火油的了。为什么来烦我呢？”结果，沙船被扣留一整天，次日经船主行贿后始得开航。对此，孙文深感清王朝的吏治之腐败，向同行的乘客问道：“中国在这些腐败万恶的官吏掌握中，你们还坐视不救么？”从而表达了意欲改造中国政治的鲜明态度。沙船抵珠江边的金星门港口，孙文即登岸向不远处的翠亨村进发。

经过西学熏陶的孙文回到双亲膝下后，向村中耆老和友邻述说了在夏威夷的见闻，并受到村民们的欢迎，还被推参与乡政，更采纳孙文的意见，改修村道，在村街上点夜灯；以轮流方式由壮丁担任夜警队，带枪巡逻护村防御盗贼。他不时向村民抨击清王朝的腐败，指出民众交了赋税却未曾收到益处，又悲叹人民迷信、愚昧和互不联络，并把矛头指向清王朝：“这是不能归咎你们的。这是你们所称的天子的不是，一个政府至少应该使他的人民得到些便于商业的基础。”

为破除迷信，孙文居乡之期常劝拜神者说：“木偶无知，信奉无益。”一天，和儿时的伙伴陆皓东到村里北帝庙，孙文戏折“北极帝神像”手臂，又将金花娘娘塑像面部刮破，毁其耳部。事后，乡绅大为鼓噪，责此“罪同大逆不道”。孙达成面对众怒，忙应承修复神像，并训斥儿子。因此，孙文在家乡呆不下去了，只好偕同陆皓东再赴香港。

陆皓东原名中桂，字献香，仅小孙文一岁，1867 年出生在香山县翠微乡，与孙文自幼即为好友。曾随在上海经商的父亲居住，父死后随母回乡，8 岁入翠亨乡塾读书，酷爱

绘画。1883年夏秋，与自夏威夷归乡的孙文重聚后，更为投契，经常谈及清朝的政治腐败情况。某日，陆皓东将在濠头乡所见清军操演的腐败之状述于孙文。他们曾认定：若有革命健儿五六十人，则可夺得虎门炮台。真可谓志同道合。

孙文 11 月到香港后，先入拔萃书室学习。这是英国圣公会所办的男子中学。不久，陆皓东也转至香港。课余，又师从伦敦会长老区凤擢补习国文，由此认识了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喜嘉理。喜嘉理牧师得知孙文的教理甚熟并坚信基督，便劝入教。孙文和陆皓东遂于 1883 年年底，接受喜嘉理的洗礼，并取《大学》汤之盘铭“苟日新、日日新、又日新”之义，而以“孙日新”的教名入教。陆则署名“申桔”。后来，区凤擢为孙氏将“日新”改为“逸仙”。

1884 年 4 月孙文以“孙帝象”之名转学人中央书院（后改名为“皇仁书院”）这是 1862 年开办的香港第一所官立中学。学校开设有英语、英国文学、世界史、英国史、地理、算术、几何、代数、卫生、机械绘图、簿记及常识等，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基础课程。孙文在中央书院学习时，经历了两件大事，一是顺从遵循早婚习俗的父母作主，18 岁时返乡与同县外壘村（今珠海市外沙村）卢耀显之女卢慕贞（1867 年~1952 年）结婚，他同卢夫人先后生育了一子（孙科）二女（孙金琰、孙金琬）。

另一是法国侵略越南和中国的战争（1883 年 8 月~1885 年 6 月）。后来，孙文在《革命原起》中明确地写道：“予自乙酉（1885 年）中法战败之年，始决倾覆清廷、创建民国之志。内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，借医术为入世之媒，十年如一日。”

正是在关注中法战争的进程中，孙文开始考察了清王朝的军备和军法规则，并确知清军没有使用外国式的枪炮。他

对清王朝的腐败和军备的落后感到十分失望。但同时，又从所居之香港华人的反法斗争，得到鼓舞：华工拒绝修理攻打台湾而受重创的法国军舰，华民拒绝为抵香港的法国商船卸货，华商不与至香港采买的法国船交易；结果引起港英当局的镇压和强迫，但港岛各行业以罢工、罢市 10 余天的斗争迫使港英让步。1884 年 10 月 9 日香港（循环日报）刊发评论道“中法自开仗之后，华人心存敌忾，无论商贾役夫，亦义切同仇”，“此可见我华人一心为国，众志成城，各具折冲御侮之才，大有灭此朝食之势，人心如此，法尚不知难而退，岂欲败亡而后已耶？”

1886 年夏天，孙中山在中央书院毕业了。他曾希望中学毕业后学习陆军、海军或法律，但均未能实如所愿，便决计习医“以为入世之谋。”当年秋天，在受洗牧师喜嘉理的推荐下，升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之南华医学堂习医（校址为今广州中山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。博济医院创办于 1835 年，是亚洲最早的西医医院，1855 年开始招收学生习医。谈到学医的目的，孙文多次明确表示：“医术亦救人之术也”；“中国人不懂得西医，更可以说中国没有西医。我学医不是谋个人的利益，而是志在救世。”此后，孙文在同学中物色了郑士良、尤列等志士。他“稍与相习，则与之谈革命”，“纵论国事”。

一年后，孙文获悉香港新开办的雅丽氏医院正在筹建医学院，1887 年 10 月 1 日正式开学。遂于该年 9 月转入香港西医书院就读。西医书院按英国医科大学 5 年学制授课，设备及师资条件较优。主办人是香港议政局华籍议员何启，院长史特渥地和实际办学人——教务长康德黎，则均为英国人；各科教师 10 余人多为专业学者或医师。

孙文在香港西医书院苦读 5 年，各学年成绩均名列前

茅。刚进书院的当年冬天，孙父达成病重，他和兄长孙眉先后归乡奉侍汤药，直到隔年春孙达成病逝，又忙料理丧事，因此前后耽搁了学业三四个月。尽管如此，1888年8月上旬举行第一学年考试时，由于奋力补课，总成绩仍名列第三。

在勤奋投入专业学习的同时，孙文还博览群书，涉猎中外知识。其中，《法国革命史》和达尔文的《物种起源》两书对他日后投身革命和认识社会，起过很大的影响。他从前者吸取到了西方资产阶级平等、博爱、自由等政治理念，而从后者明了物种起源的进化论学说，于是就在思想上更加坚定了民主主义的信念。

同时，他还常与同学议论国事，先后交结了不少友人，但以与陈少白、尤列、杨鹤龄最为投契。孙文自述道：“数年之间，每于学课余暇，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，常往来于香港、澳门之间，大放厥词，无所忌讳。时闻而附和者，在香港只陈少白、尤少纨（列）、杨鹤龄三人，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。若其他之交游，闻吾言者，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，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。予与陈、尤、杨三人常住香港，听夕往还，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，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，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。四人相依甚密，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，数年如一日。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，皆呼予等为‘四大寇’。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。”此外，王孟琴、何隆简、杨迺安等人亦常至西医书院聚谈。

杨鹤龄也是翠亨村人，家世豪富，与孙文结识最早，杨氏在香港歌赋街开设了杨耀记商号。商号的楼上便是他们相聚的处所。孙文常在此“高谈时事，意气激昂，”并勇敢的发出了渺视“当今圣上”的呼吁：“勿敬朝廷”^①而且“郑士良、陆皓东等来往广州、上海，过港时，亦常下榻其间，

故该店可称革命党人最初之政谈俱乐部。”

1892年7月23日，孙文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典礼上，因毕业考试成绩优秀名列第一，获得港督罗便臣颁发的奖品，教务长康德黎颁发的中英文对列的毕业行医执照。香港西医书院的学医生活，是孙文最终走向革命职业家道路的重要时期。30年后，孙中山到香港大学演说时，有如下的深刻总结：“我之此等思想发源地即为香港。至于如何得之，则我于30年前在香港读书，暇时辄闲步市街，见其秩序整齐、建筑宏美，工作进步不断，脑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。我每年回故里香山二次，两地相较，情形迥异。我恒默念香山、香港，相距仅50英里，何以如此不同？”于是，“由市政之研究进而为政治之研究”；又闻诸长老英国及欧洲之良〔好〕政治，并非固有者，乃人经营而改变之耳。从前英国政治，亦复腐败恶劣，顾英人爱自由，金曰：‘吾人不复能忍耐此等事，必有以更张之，有志竟成，卒达目的。’我因此遂作一想曰：‘曷为吾人不能改革中国之恶政治耶？’我因此于大学毕业之后，即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，而从事于医国事业。由此可知我之革命思想，完全得之香港也。”

那么，孙文是如何走向革命道路的呢？1892年7月他毕业之初，有港督罗便臣驰书北京英公使托其转商于北洋大臣李鸿章，谓“孙文与江英华两人识优学良，能耐劳苦，请予任用。但却因两广总督衙门诸多为难，并欲使填写三代履历等等，方准领牌而晋京。”于是，便在澳门镜湖医院行医，并开设中西药局于草堆街84号。但被澳门葡萄牙籍医生排挤，“始则禁阻予不得为葡人治病，继则饬令药房：见有他国医生所定药方，不得为之配合。”于是，次年秋，孙文被迫转至广州继续行医。

孙文在广州开业之初，悬牌于双门底圣教书楼，书楼内

进为基督教礼拜堂，传教士为王质甫。所开的东西药局设西关冼基。他“每日在药局应诊，晨 10 时至 12 时为赠诊时间，下午出诊，酬金由病者随意致送，若难产、服毒急症，不论贫富，一邀即至。医务之盛，一如澳门。粤中官绅与民众，无不知有孙逸仙医生之名者。”

孙文一面履行医生职务，救死扶伤；一面继续物色反清志士，畅谈时政。他日后自述也说：“悬壶于澳门、羊城两地以问世，而实则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。”

其间，孙文开始了“改革中国恶劣政治”的努力。康有为 1891 年春移长兴学舍于广府学宫，并改名万木草堂，继续招徒讲学。此地，与双门底圣教书楼相距不远，康有为常在该书楼购书，孙文知其有志而学，欲与之结交，便托友人代转此意。康有为闻告，却提出条件说：“孙某人就欲与我订交，宜先具门生帖子拜师才可以。”孙文认为康氏“妄自尊大”遂未往与见。

1893 年“冬初，开会议于城南广雅书局内南园之抗风轩。盖尤列曾为附设书局内之广东舆图局之测绘生，与局员习熟，因得借用之。时到会者，有孙文及程耀宸、程奎光和璧光弟兄两人、陆皓东、魏友琴、郑士良、尤列诸人。”孙文在会上首次倡议，宜先成立团体，以“驱除鞑虏，恢复华夏”为宗旨。与会者皆赞成，但未及定名和具体建立组织，原因主要是成员过少。同时，牧师王质甫、区凤墀等，也相与闻。

不久，孙文即独返翠亨老家新居，闭门起草《上李鸿章书》。此新居是一年多前即 1892 年之初，兄长孙眉自檀香山汇回千余两银款后，孙文乃返乡在 1885 年孙眉所建的房宅基础上，亲自设计图样而扩建成的一座中西合璧式之二层楼房。门首悬挂着他的亲笔书联：“一椽得所，五桂安居。”

这也就是，如今闻名于海内外的翠亨“孙中山故居。”

1894年1月16日，孙文自家乡直赴香港，找到尚在西医书院就读的陈少白，致歉道：“对不起！对不起！”陈少白责孙说：“你跑到什么地方去了？连招呼都不打一个，西关洗基的东西药局来信说你失踪了，药房周转不灵了，我只好赶到广州去替你撑持店务。”孙文听后，只说：“这些事情不要去管他了。你看，”边说边将手里的纸卷展开递给陈少白过目。

陈少白接手一看，原来是一篇《上李鸿章书》，遂道：“原来，你是跑回翠亨村的家里，关起门来做文章去了！”孙文说：“我们革命有二种途径，一为中央革命，一为地方革命。如此项条陈能得李总督采纳，则借此进身，可以实行中央革命，较地方革命为事半功倍。”听后，陈少白亦以为然，又问：“孙兄，你何时有此想法的？手笔真快啊。”孙文道：“三年前，我就想上书总署，以陈时势之得失。此书即由我在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腹稿脱出的，请你替我修改修改。”

孙文说的，确是实情。这封写给直隶（河北）总督李鸿章的8000余言条陈，是由《致郑藻如书》和（农功）等文章充实、衍化而成。郑藻如是孙文的同乡，这位洋务派人士曾任津海关道及出使美国、西班牙、秘鲁等国大使，1886年病休归于香山县濠头乡。早在康有为1888年由北京首次上书光绪帝后的第1年——1890年，孙文曾就奖励农业、禁烟劝戒和发展教育等三大问题提出过自己的建议。

陈少白既是快手笔，又是孙文的志同道合的知己，便也不加推辞，提笔作了修改，随即交还孙文。孙文此次直接上书李鸿章的动机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是“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，政府之或可奋起。”

1894年春末，孙文将药局托付陈少白代管，医务交由

尹文楷分担，然后，欲邀上好友陆皓东，故而搭轮船由海路离粤北赴上海。行前，曾请出任过澳门海防同知的魏恒致函盛宙怀以为引荐。抵上海，下榻三洋泾桥附近的名利客栈。接着，与陆皓东联络。

原来，陆皓东在香港加入基督教后不久，便前往上海学习电报技术，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芜湖电报局工作，先任电报翻译生旋擢升为领班。常在路过港时与就读西医书院的孙文以及陈少白、杨鹤龄、尤列等聚谈时政，谋划造反，极为投契。1891年陆皓东回乡完婚，又与孙文抵足长谈，讨论救国之途。陆皓东因“以外患之日迫，欲治其标”，强调御侮为急务；孙文则强调“满仇之必报，思治其本”，首先应“造反覆满”。两人连日辩驳之后，达成了共识：武力倒清而“惊醒黄魂，光复汉族”。正是基于这种共同的思想，孙文在上书时取道上海，选择陆皓东参预其行。

在上海，孙中山即持友人函介，分头访晤盛宙怀、郑观应等人。6月13日，盛宙怀读过魏恒6月1日书信后，也提笔致书其兄盛宣怀亲荐孙文。

郑观应与孙文本为同乡，其所编《盛世危言》第3卷已辑入了述及孙文活动的《农功》，“今吾邑孙翠溪（按：孙文别称）西医颇留心植物之理，曾于香山试种罌粟，与印度所产之味无殊。犹恐植物新法未精，尚欲游学欧洲，讲求新法，返国试办。惟恐当道不能保护，反为之阻遏，是以踌躇未果。”因此，见到孙文后十分热心。不过，郑观应因早年投身洋行并关心时政、热心西学且为洋务派出力，得李鸿章赏识而重用；可是，中法战争期间，奉调赴粤会办湘军营务时，曾只身进入暹罗（泰国）以及金边、西贡侦探敌情，并反对李鸿章在上海议和而遭致洋务派排斥。因而，他对孙文上书之举虽很赞成，但已不便直函李鸿章，遂专函致盛宣怀

竭力推荐。

郑观应函告盛宣怀道：“敝邑有孙逸仙者，少年英俊，曾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，留心西学，有志农桑生植之要求，欲游历法国讲求养蚕之法，及游西北省履勘荒旷之区，招人开垦，免致华工受困于外洋，其志不可谓不高，其说亦颇切近，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。兹欲北游津门、上书傅相，一白其胸中之素蕴，弟特以尺函为其介，俾叩谒台端。”还道：“孙逸仙医生拟自备斧资，先游泰西各国，学习务农，艺成而后返中国，与同志集资设书院教人，并拟游历新疆、琼州、台湾，招人开垦，嘱弟恳我公代求傅相，转请总署给予游历泰西各国护照一纸，俾到外国向该国外部发给游学执照，以利遄行。”

孙文在郑观应家作客时，邂逅了王韬。王韬因曾化名“黄畹”上书太平天国凛王刘肇均而为清廷所缉拿，幸得英领事麦华陀庇护出逃香港，并为英传教士理雅各翻译四书、五经，后随理雅各赴英译书，曾游历英、法、俄等国。1874年在香港主办（循环日报）力主变法自强。1844年经李鸿章默许而得重返上海主持格致书院。因其与太平天国上层人物有过交往，孙文又景仰洪秀全的事业，所以他们一见如故，成了忘年之交。孙文遂就上书内容同王韬仔细商量，王韬也如请替孙加以修改。

王韬因有朋友罗丰禄正在李鸿章幕下作文案工作，便特意致函嘱罗协助孙文，促成上书。孙文带上友朋的引荐信，同陆皓东于6月下旬自沪抵津，落脚法国租界佛满楼客栈。随后，孙文持盛宣怀之函至津海关道盛宣怀府。盛宣怀收到乃弟之函，内云：“顷有沪堂教习唐心存兄之同窗孙逸仙兄，系广东香山县人，精熟欧洲医理，并由广东前山同知魏直牧（按：即魏恒）函托求转吾哥俯赐吹植。”又得好友郑观应之

函，倒也将书信留下。提过不赘。

单说孙文递过给盛宣怀的介绍函后，一连数日不得要领，遂又持王韬书，投递直督府幕僚罗丰禄。罗氏得王韬推荐信后，十分热忱地接待了孙文。又将同事、总理衙门小吏徐秋畦约出与孙文相见。孙文简单地讲述了上书之意图，罗、徐听后，均表示愿相机协助。孙文遂将其上书，托交他们代转；不久，他们果将其书递送李鸿章。

孙文在《上李鸿章书》中陈述了他对国是之主张：“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，不尽在于船坚炮利、垒固兵强，而在于人能尽其才，地能尽其利，物能尽其用，货能畅其流。”此4条乃“富强之大经，治国之大本”，故“我国家欲恢扩宏图、勤求远略，仿行西法以筹自强，而……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，是舍本而图末也。”

所谓“人能尽其才”，须“教养有道，鼓励有方，任使得法。”他主张仿照资本主义教育，创办新式学校以培养人才，并且，尊重和合理使用人才，即：“虽一才一艺之微，而国家必宠以科名，是故人能为奋，士不虚生。”对于发明创造，宜“必邀国家之上赏，则其国之士，岂有不专心致志者哉？”

所谓“地能尽其利”，须使“农政有官，农务有学，耕耘有器。”他主张重视农业发展，开设农业学堂，设立农艺博览会，派人出洋考察，认真开垦荒地，努力实现耕作机械化。果如此，犁地，“一器能作数百牛马之工；起水，则一器能灌千顷之稻；收获，则一器能当数百人之刈。”可见，“机器之于农，其用亦大矣哉。”故“多以器代牛马之用”，“则能使同等之田，产数倍之物，是无异将一亩之田变为数亩之用，即无异将一国之地，广为数国之大也。”如此之后，“则民虽增数倍，可无饥馑之忧矣。”

所谓“物能尽其用”，须“穷理日精，机器日巧，不作无益以害有益。”他举例：“如化学精，凡动植矿质之物，昔人已知其用者，固能广而用之；昔人未知用者，今亦考出以为用。火油也，昔弃置如遗，今为日用之需要……然而，物之用更有不止于此者，若人能穷求其理，理愈明而用愈广。如电，无形物质，似物非物，其气附于万物之中，合乎六合之内，其为用较万物为最广而又最灵，可以作烛，可以传邮，可以运机，可以育物，可以开矿。”因此，“由此而推，物用愈求则人力愈省，将来必至人只用心，不事劳人力而全役物力矣。”

所谓“货能畅其流”，须“在关卡之无阻难，保商之有善法，多轮船铁道之载运。”最后，孙文的上书指出：“农政之兴，尤为今日之急务也，”表示愿出国赴法研究蚕商新法、医治蚕病，兼而考察各国之农业，再回国后想游历内地、新疆、关外东北等处，准备仿效西方，改革中国的农业；并强调：“天下之事，不患不能行，而患无行之人；方今中国之不振，固患于能行之人少，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。”

这时，中日两国均已出兵朝鲜，甲午战争行将爆发。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，而且掌管着清王朝外交、军事和经济大权的李鸿章，已“至芦台督师，军书旁午”。对于是否见孙之询，只漫声应答道：“打完仗了以后，再见吧！”好在罗丰禄为人诚实，对李鸿章拒绝延见颇感歉意，遂尽力奔走，终于为孙文代领了农桑会出国筹款护照一张，略补此歉。

李鸿章是否看过孙文的上书，已无可确知。但当年，上海出版的《万国公报》月刊，却将此信的 8000 余字以（上李傅相书）为题，在第 69、70 两册里全文加以连载传世。提过不赘。

单说孙文和陆皓东在天津法租界佛满楼客栈，急切地等候了 10 余天却只得到一纸公务护照，故而对清王朝如此不重言路颇有微词；加上所目睹的腐败之态，深感“无可救药。”日后，孙文写道：“李曾经积累了怎样大量的财富，是远近皆知的”；“正在中日战争开始之前，我在天津，有很好的机会看到他发财致富的方法之一，就是各级文武官员从整个国家各部分成群而来请求任命，但是就在他们的呈文到达李鸿章以前，他们必须支付大量的贿赂给李的随员。”

天津上书的失败，使孙文转寻新的道路。日后，他总结说：“吾党于是恍然长叹，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，然望治之心愈坚，要求之念愈切，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能不稍易以强迫。”

孙文和陆皓东失望而又愤懑地离开了天津，取道北京，经过武汉而折返上海。此时，清军对日作战迭遭失败；孙文怀着忧愤，入秋再赴夏威夷。这时，檀香山已建立了夏威夷共和国临时政府，美国正在蚕食檀香山。孙文到后，先去茂宜岛会见孙眉，告以拟向旧日亲友集资回国，实行反清复汉之义举，得到了孙眉的赞同，并特划拨一部分财产为助。他又向檀香山的亲友致函宣介孙文的打算。可是，华侨中有觉悟者太少，连昔日的亲故亦多掩耳避走，惟恐涉嫌而遭破家灭族之祸。好在头年（1893 年）冬，檀岛华侨何宽、郑金、程雨亨、黄庆培、蓝从真、程官有、何福、陆文灿、叶桂芳、程禹臣等曾组建“中西扩论会”。这时，邀请孙文前往演说，局面始有所开辟。后又在《隆记报》设立机关开展工作。这样，孙文经过耐心宣传、多方游说，加之同道几个月的不懈努力，终得集合同志十数人。

1894 年 11 月 24 日（旧历十月二十七日），孙文在檀香山借卑涉银行经理何宽的宅地举行了一次会议。到会有何

宽、李昌、刘祥、黄华恢、程蔚南、郑金、邓松盛（号荫南）、郑照、黄亮、钟木贤、许直臣、李多马、李禄、卓海、林鉴泉、钟（工）宇、刘寿、曹彩、刘卓、宋居仁、夏百子、侯艾泉、李杞等 20 余人。作为主席孙文首先发言。他提议成立的团体定名为：“兴中会”，以“振兴中华，挽救危局”为宗旨，并将起草的 9 条章程一一宣读，众无异议，遂为通过；又按规定方式投票选出永和泰商号司理刘祥及何宽，出任檀香山埠兴中会正、副主席。永和泰商号司账黄华恢为管库；程蔚南、许直臣为正、副文案。李昌、郑金、邓松盛（荫南）、黄亮、李禄、李多马、钟（工）宇、林鉴泉等为值理。这样，中国的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——兴中会便在檀香山宣告正式成立。

会后，孙文又让各会员填写了《入会盟书》，其辞为：“联盟人□□省□□县人□□□，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国，创立合众政府，倘有贰心，神明鉴察。”随行宣誓，由李昌朗诵誓词，各以左手置耶稣基督教圣经上，举右手向天依次读之，如仪而毕。

《兴中会章程》有云：“中国积弱，非一日矣！上则因循苟且，粉饰虚张；下则蒙昧无知，鲜能远虑。近之辱国丧师，翦藩压境，堂堂华夏，不齿于列邦，文物冠裳，被轻于异族，有志之士，能无抚膺！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，数万里土地之饶，固可发奋为雄，无敌于天下。乃以庸奴误国，涂（荼）毒苍生，一蹶不兴，如斯之极。方今强邻环列，虎视鹰瞵，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、物产之饶。蚕食鲸吞，已效尤于接踵；瓜分豆剖，实堪虑于目前。有心人不忍大声疾呼，亟拯斯民于水火，切扶大厦之将倾。用特集会众以兴中，协贤豪而共济，抒此时艰，奠我中夏。”

规条称：“是会之设，专为振兴中华，维持团体起见。